

从研中海外
书究国外

刘东主编

CHINESE WOMEN AND RURAL DEVELOPMENT



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

——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

Sixty Years of Change in Lu Village Yunnan

「加」宝森著

胡玉坤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从书
研究中国海外

刘东主编
周文彬总策划

CHINESE WOMEN AND RURAL DEVELOPMENT

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

——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

Sixty Years of Change in Lu Village Yunnan

〔加〕宝森著

胡玉坤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加]宝森著；
胡玉坤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ISBN 7-214-03882-X

I. 中... II. ①宝... ②胡... III. 乡村-妇女-问题-调查
研究-禄村-1939~1989 IV. D442.8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5414 号

Chinese Women and Rural Development: Sixty Years of Change in Lu Village, Yunnan

Copyright © 2002 by Laurel Bosse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All right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4-233

书 名 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
著 者 [加]宝森
译 者 胡玉坤
责任编辑 府建明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5.5 插页 2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882-X/D·592
定 价 33.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谨以此书献给

弥敦(Nathan)

英格里德(Ingrid)

斯蒂芬(Stephan)

安妮卡(Annika)

塞拉芬娜(Seraphina)

重量与度量单位

1 工 = 0.4 亩(工是禄丰地区使用的当地单位,最初相当于一天的劳动)
= 0.027 公顷

1 斤 = 0.5 公斤 = 1.1 磅

1 公顷 = 2.47 英亩

1 里 = 0.5 公里或 1/3 英里

1 亩 = 1/6 英亩 = 0.067 公顷

1 元 = 20 美分(1990 年)

从容量到重量的转换

1 升稻谷 = 0.85 公斤

1 升稻米 = 0.54 公斤

关于传统拼写法的解释

在整本书中,我采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的当代拼音系统。旧拼法只是在英语世界的人们可能更熟悉的情况才予以保留,比如“蒋介石”(Chiang Kai Shek)的拼写。当它们第一次出现采用了不同拼写系统的旧出版物时,我在括号内保留了其原先名字的拼法,比如“费孝通和张之毅”(Fei and Zhang [Fei and Chang])。为了保持一致性,费孝通、张之毅及田汝康(Tian [T'ien])著作中采用不同拼法涉及的人名和地名,都被转成了当代拼音或英语拼法,甚至在直接引文中也如此。因此,表明“禄村”的 Luts'un 就写成了 Lu Village, Tali (大理)写成了 Dali, Chang(张)写成了 Zhang, Soong (宋)写成了 Song, kung(工)写成了 gong, mow(亩)写成了 mu。

致 谢

在以往十年,许多人帮助并鼓励过我致力于这一项目。我的研究得到了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委员会(SSHRC)、魁北克省培训与研究基金会(FCAR)及麦吉尔(McGill)大学研究生院与人类学系等个人和团体赠款的慷慨资助。在麦吉尔大学,我也得到了社会、技术与发展中心(STANDDD)、麦吉尔妇女研究与教学中心(MCRTW)及东亚研究中心等机构的支持。在中国的机构中,我要感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接纳及其提供的机会,使我有幸结识了给予我帮助的许多同事。当我在昆明时,云南大学时常成为我的一个工作基地、相聚之处以及信息中心。其他提供了帮助的机构还包括云南省妇联、禄丰县政府、禄丰县妇联、金山镇与禄村政府。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学服务中心图书馆也提供了很大帮助。这个中心本身成为溢满信息和活跃的学术交流气氛的一片绿洲。

麦吉尔大学的同仁始终给予我很大支持。在他们当中,我要特别感谢唐·阿特伍德、约翰·加拉蒂、富米科·艾卡瓦-史密斯、菲利浦·萨尔兹曼、德博拉·西克、布鲁斯·特里格尔和已故的里查德·索伯兹伯里。托尼·马斯和汤姆·莱格兰格对第八章提出过有益的见解,而弥敦·宝森、诺玛·戴蒙德、葆拉·弗里德曼、希尔·盖茨、西格朗·哈达多蒂、朱迪思·米切尔及玛格丽特·斯温则对整本书稿提过意见。我要感谢凯瑟琳·布朗、陈春、胡晓文、胡晓聪、伊桑·米切尔森、斯科特·西蒙、布赖恩·汤姆和赵天婴在研究和制图上给予的帮助。在系里,我要感谢罗斯·

玛丽·斯坦诺、黛安娜·曼和辛西娅·罗马尼克给予的帮助。

其他许多人在不同时刻也都提供了信息、见解和鼓励。他们当中包括苏珊·布卢姆、孔迈隆、尤金·库珀、斯蒂芬·哈利尔、玛丽亚·贾施乔克、朱爱岚、威廉·拉夫利、希瑟·彼得斯、格洛丽亚·怀特和玛杰里·沃尔夫。我要特别感谢希尔·盖茨在研究缠足问题上给予的帮助,她将自己的问卷寄给我用于云南的调查。西格朗·哈达多蒂使我1999年的田野之旅那么令人愉悦。

在中国,我得到了更多朋友和同事的协助,可惜我不能在此一一列出。这些人中包括云南省社科院的贺耀华、贺志雄、贺中华、李曾、邱宝林、俞文兰、赵君辰、周永华、朱霞和已故的郭震斌、袁德珍,郑州大学的李小江,复旦大学的陈惇。禄丰县的潘振富、贺建明、钱成润慷慨提供了关于该县的书籍。顾向苒、王琴生、雷红、郭萍等是金山镇政府中提供了数据的人。在田野调查中帮助过我的人包括俞文兰、周永华、王芬、王茜滢以及我不能够在此一一列出姓名的其他许多人。朱霞在作访谈和进行问卷调查上提供了特别的帮助。胡夫和杨扬为我做了云南之行的准备工作。我感激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和田汝康给予的建议和鼓励。我在昆明逗留时,已故的项京云及其妻子刘德伟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友情和盛情款待,并教会了我许多关于中国的东西。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副主任雄京明给予了我友谊、鼓励和款待。加拿大前驻华大使弗雷德·比尔德及夫人伊娃·比尔德在北京招待了我,并使我有机会拜见费孝通。

我要感谢 Rowman & Littlefield 出版公司的执行编辑苏珊·麦埃克伦、制作编辑杰汉·施韦策和印刷编辑德弗·康普顿帮助我准备此书的出版。

回眸逝去的那个世纪,我们可以对所发生的一些重大技术变迁感到欣慰。这些变化使无数妇女放弃了在织机前织布转而在电脑上写作。我非常感激弥敦的帮助,这使我回想起他如何模仿《织女叹》,当妻子在家里无休止地从事她的工作时,其丈夫站在一旁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女作家叹

饥肠辘辘，她依旧在书写，
酷寒冻僵了，她还在撰写，
一页一页又一页。
时日苦短，
天寒地冻（在蒙特利尔），
每一章的完成何其之难……
夫君欲劝阻，
可心又何忍。
默默不做声，
只是悄然站在电脑旁。

我最深切地感激我的家人，感谢弥敦，是他第一次带我去了中国，并给了我鼓励，我们共享了美好时光，也共度了艰难岁月。我要感谢英格里德，她不得不容忍了一个从事人类学的母亲，并愉快而机敏地经受了这一切。她在1999年最终同我一起访问了中国，并受到热情的欢迎。再次感谢我的父母已为时太晚了，在其谢世之后很久，他们的支持一直支撑着我。

序言：发现了一个母系制家庭

1989年7月我第一次来到了云南省禄村。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县里及当地镇上一小群外来官员代表的陪同下，我坐上了镇里的吉普车。车子在村落入口处石头标记前停了下来。作为访问该村的“第一个”北美人——至少就那时人们的记忆所及——我的出现使村民们打断其正常活动，走出家门来观望。村民们确实告诉我，我是来他们村访问的第一个外国人，有的甚至说我是他们亲眼见过的第一个外国人。^①当人群开始聚集时，官员们保护性地将我带入了二层楼的禄村村委会所在地。在一个排列着桌椅的大会议室里，他们端上了茶水。随后，村领导、旁观者、我本人以及来自省与镇组织的官方随从20多人开了一个公共会议。在那里，我的陪同人员将我正式介绍给了当地官员，后者反过来又介绍了他们村，叙述了基本的经济状况。他们沿用的是村领导在任何时候有外来贵宾或权威光顾时采用的套话（作为有博士头衔的一名大学教授，我具备了被当做贵宾的资格）。

我解释说我对妇女与农村发展尤其是妇女的社会与经济生活感兴趣，并谈到我要研究自中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30年代在那里开展研究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党支书指向了两个女领导——一个妇代会主任和一个计划生育干部，要我问她们有关妇女在村里作用的问题，我这样做了。这些微笑而坦率的妇女简短叙述了该社区妇女从事的工作类型。她们在绝大多数听众都是男性的事实场合并不乏勇气，并在大多数人属于本村村民的一

屋子人面前自信地谈论着。她们简述的妇女工作是非常积极而实在的,但讲得很肤浅。她们坦诚的态度似乎是在说:“现在我们已告诉你关于妇女及其工作了,你还想知道别的什么?”当我问及妇女的非农机会时,领导们安排带我到村里去转一转,去“视察一下”妇女做豆腐卖的当地人家。

由地方组织向上级、外来权威人士汇报情况的这类公共活动,总令我很不自在,特别是当我注意到有权势的镇领导同来自城市享有声望的学者、“尊贵的外宾”同必须履行职责的村领导之间不那么微妙的地位差异时更是如此。然而,当会议结束之后,我终于摆脱了正规礼节和随从,开始同几个妇女包括女领导闲聊了起来。一旦“离开了舞台”,我们都对刚才繁琐的礼节感到可笑,我知道我们是可以融洽相处的。作为村妇女代表,她们都是达观、健壮的中年人,看上去很自信而务实,她们在政治领导人面前显得很自如。她们也很理解我在发展的情境下研究妇女的兴趣以及我对于同妇女直接交谈的重视。

会议结束之后,我们一行沿着村里狭窄的主街步行。走到村庄的尽头,我们在一幢二层的新屋前停了下来,欣赏起这个现代建筑。这是党支书(村里最重要的领导)的家,他诚恳地邀请我们进去再喝点茶。我很害怕每个人都坐下来寒暄的装腔作势的场合,但一旦进入了这家的庭院,气氛就变得不那么正规了。我们在呷茶时,小孩子在周围奔跑玩耍,我们这些来访者都开始放松了下来。为了摆脱频频为男性官员和正规俗套所淹没的感觉,我同这家的妇女们交谈了起来,询问她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家里看上去有那么多妇女!这个支书有5个成年子女,其中4个是女儿。那天在他家里我首先碰到了他妻子,一个刚毅、自信的中年妇女,她不失尊严而自信地欢迎官员们。我随后碰到了一个高个子瘦削而结实的老年妇女,在她轮廓分明的脸上两眼闪闪发亮。她穿着整洁的传统的蓝裤子与短上衣,村支书管她叫“妈”。嗣后,我被介绍给更年轻的一些妇女——他的已婚女儿及其中一个女儿的丈夫。

我开始写下她们的名字,期待有时间能作更多的回访。正是在那时,我发现这个支书生活在从妻居的家庭中——即男子成为他妻子家庭的成员,而不是相反。他母亲和女儿的姓都不随他的,而在父系制之下人们是被要求从父姓的。他叫“妈”的那位妇女是他的岳母,他女儿们的姓都是他妻子家的姓。他其中一个女儿当然也是入赘婚(uxorilocally married),即“招进”了丈夫,而不是嫁出去。没有人表现出认为这些婚姻安排有任何异常的迹象。我一旦意识到在院子里忙碌的所有这些妇女都是母亲和女儿时,发现以下事实就不足为怪了,即最小的小姑娘——希望支书抱着她到各处转悠(他经常这么做)的一个刚学步者——是第四代,她也是由曾外婆、外婆(支书的妻子)、母亲和女儿构成的一个母系制共居家庭中最年幼的成员。

这当然有别于此前数月我所生活的河南省村落里严格的父权制家庭,我在那里做访谈时不曾遇到过从妻居婚姻的任何个案。这一户的不寻常之处不仅在于它偏离了从夫居标准,而且在于其丈夫地位上的不同。关于中国家庭的传统文献都强调,入赘婚中的男性一般是被瞧不起的,然而,这个党支书显然并非如此。他长期担任由15个不同村组成的一个行政村的领导,他在约20多个当地干部中职务是最高的。这是我初到禄村时了解到的情况,当然激起了我的兴趣和回访愿望。在对其他4个村落(2个在云南,2个在河南)进行了相对短暂的比较研究之后,我意识到,有费孝通以前的研究作为基础,禄村将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研究革命前时期迄今妇女经历的发展变化。

有关安排的交涉

1990年我回到了禄村进行了为期数月的较长时间的研究,那时只有我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要来的助理(一个女青年)陪着。镇官员热情地欢迎我们。由于官员们并不理解涉及在村里长期居住的传统田野研究,也由于他们不能想像这种研究的内容或影

响(这可能给他们带来些麻烦),他们坚持让我住在市场中心的旅馆里。既为了维持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形象,又为了一个外国妇女(她被认为在政治上不可靠,脆弱的并且不习惯艰苦生活)的健康与安全,当局决定不改变我时常提出的住在村里的要求。

对国外研究者而言,官员们关心的事情虽然看上去通常显得很武断又无知,作为政治借口也是软弱无力的,这对于严肃的研究是个影响,但我试图使自己设身处地为官员们着想。假如我得了重病,或成为犯罪行为的牺牲品,或由于公开谴责社会主义的某些缺陷而“使中国人感到难堪”,他们是要负责任的。由于普遍存在的城市偏见,官员们也相信,村落比城镇中心更危险,因为在城镇官员们控制了警力。我怀疑他们另一个动机可能是为了填补赔钱的政府旅馆。就这样,我别无选择,只得住在他们的旅馆里,我就呆在费孝通 1990 年做两天重访时下榻的那间房子里。

我同几个村民协商开展研究的事宜。我雇了一个刚从工艺学校毕业的女青年当我的研究助理,帮我确定 80 个样本户,并进行访谈。其他官员和村民在整个项目过程中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特别是聪明、能干的妇女主任和计划生育员及其家属都很乐意给予解释、帮助联系并讲述当地状况和家庭生活。我们作出安排经常固定在一家吃饭,但也时常应邀在其他人家吃饭、休息并作调查。

自那时起,我多次回到禄村,进行或短或长的田野考察和调查,有时同来自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女助理一起去,有时独自一人或与家属同行。遵从玛杰里·沃尔夫(1985)有关当研究者丈夫到场时女研究者被当做次要关注目标的忠告,在我自己站稳脚跟之前避免带我丈夫前往,即使他不是个学者。在他第一次前去访问时,当地官员在我得知之前就匆忙杀了一只火鸡设宴招待他。

当中国变得越来越开放,并愈益习惯于接纳来访者时,各种安排的拘泥形式就减少了,但村民们的盛情总是不同寻常的。在 1991 年和 1993 年,我搜集了许多妇女生活史的资料。1995 年和

1996年,我再次回来进行了更多访谈,还参加了婚礼,进一步从总体上了解村里生活与变化的各个方面。1999年更近的一次实地考察正好赶在稻谷收割时节,这为我提供了观察和参与某些劳动以及得到其他变化信息的机会。这也使我碰到了来自冰岛的一个博士研究生西格朗·哈达多蒂,她也是来禄村做人类学研究的。

计划与意外收获

为了探究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这一主题,我的目标是通过田野调查获得定量(quantitative)与质性(qualitative)信息。我从村镇官员那里索取了定量数据,通常是从手写的表格中抄录的。这类数据表明了有关村里的官方看法,它们对于理解禄村的经济与社会总体特征很重要。这对于确定禄村内部的变异并将禄村的一般情况同镇、省及全国其他地方的状况作对比也很有用。

我使用了禄村政府办公室的户口登记簿来选择访谈的随机抽样样本。我从中选取了两种访谈样本。第一套访谈有80多户,是1990年进行的;第二套访谈有50户,是1997年由一个助手完成的。这些访谈覆盖了诸如家庭成员、就业、农业劳动分工、收入与支出、婚礼与盖房花销、生育与生育控制、迁徙、政治经历及现代财物等。1996年对老年妇女进行了另一套50份的问卷调查,以便对费孝通研究时期妇女的状况有更清晰的了解。这些问卷涉及到了婚姻、妇女为自己家及其丈夫家从事的工作以及她们家的缠足活动。此外,我选择了许多个人进行了较长时间访谈并搜集了生活史的资料。^②这些个人大部分是从我随机抽样样本中已访谈过的那些人中基于趣味相投或兴趣而选择的。因此,其生活得到了更详尽陈述的人,兴许是那些更习惯于同陌生人交谈的人。所以,她们的故事可能并不包括较无技能或兴趣同外界沟通的那些人。政府官员即干部是那些同陌生人交谈最轻松自如的人群,尽管他们可能有相当定型化的介绍村里情况的方式,但他

们自己的生活则往往充满远非程式化的丰富多彩的经历。

我在多数田野考察中,都由来自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作为**陪同**的某个人陪着。起初,像大多数外国研究人员一样,我感到要求这样做是为了盯着我,对此还颇感不快。我还被要求支付他们的开销以及各种行政费用。但我意识到,假如我要求**陪同**我的是妇女,并聘她们为研究助理,她们对于我的研究可能会起宝贵的作用。在下面各章,我不时提到陪伴我的研究助理而没有列出具体名字。我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混淆,因为我在禄村时曾同三个不同的女青年俞文兰、王芬、朱霞分别工作过。俞文兰和王芬1990年帮过我。俞文兰1991年又一次同我前往。在1993—1997年间的不同调查中,我雇了非常能干的朱霞当我的助手。我感到非常庆幸能同这三个女青年一起工作,她们每个人都很聪明,而且非常勤奋。特别是朱霞,1996年和1997年帮我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则最终负责所收集到的数据的研究和解释。

值得一提的是,外国研究者、研究助理同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总是错综复杂的。我发现,在我最初的调查中,当我助手还是年轻的单身女子时,讨论性、生育控制及生孩子等问题时最初使她们感到很不好意思,当被访的村妇意识到我的助理是未婚者时也感到很不自在。但她们相当乐意同我讨论这种主题,因为她们**知道**我已婚并有一个女儿。当我问及生育控制的问题时,王芬起初常常离开房间,即使我的发音很难为当地妇女所理解,而王的协助很有用时。随着岁月流逝,这些年轻妇女们每个人都结婚并生了孩子,到那时,由她们在场讨论更宽泛的各种主题时就变得更能被接受了。村妇们在谈到这些主题时很谨慎,即使关于生育控制的信息得到了广泛而公开的传播。

我田野考察的质性方面促使我在村里尽可能多呆些时间,访问并观察不同的活动。我几乎每天都在村里吃饭,并应邀在许多人家吃过。我观看菜园、猪圈并上厕所。我也应邀参加婚礼和其他庆典。我参与并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我最珍爱的一些回忆是在学校校园打篮球,观看孩子们玩斗蛐蛐,爬山去找野蘑菇,同

一群朋友坐在街边或院子里聊天。我对割稻时节的酷热和疲乏也有清晰的记忆。参加村务会议较不费力,但它们又长又慢。我走访各地各种场所,赶集,拜访在城里有工作或公寓的村民的亲戚。我也同镇官员一起开会吃饭,复印镇办公室档案,购物,并骑着我的自行车转悠,参观当地寺庙和恐龙博物馆,并坐马车和公共汽车。在城里,有人请我将政府旅馆的名字和县里恐龙博物馆的简介翻译成英语(该地区因其恐龙化石而闻名)。镇官员也邀请我参加并拍摄当地文艺演出,来自禄村的表演者同镇里其他村争夺奖项。涉足城镇生活,并没有使我感到我是远离了村落生活的,因为我通常在那里碰到村民们,并了解到他们到那里购物、走访或做其他生意的频率。

我研究的结果既是预期的,又有意外的收获。我原先计划获得基本的人口与经济数据,但我并未打算去了解女性自杀或缠足问题。我没想到能去参加一个分地的会议,我当然也没想到去观看村文艺演出的许多彩排(为了参加在县里举办的一个大型杂艺表演)。我总觉得田野调查是“机会主义的”(opportunistic),我当然也觉得我的机会受到政府强加的大量限制的局限:我经过了一套复杂的程序才获准去做研究,当局不允许我睡在村里,最初要求我做短暂的调查以及由政府职员陪着我。同时,我能同村民和镇官员(他们极其好客并给予了帮助)在一起呆很多时间,意味着我对省外事办不知名的官员可能存有的恼怒情绪,被为我提供了友好协助的人们驱散了。经过10年的田野考察,我对村里许多老朋友的拜访都是令人兴奋和非正式的,而我同官员(他们在此期间都有了变换)的联系则更疏远些。

注 释

-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在附近可能见过美国大兵,但许多人那时还太小以至于都记不起来了。
- ② 在整本书中,为了保护被访者个人的隐私权,我为禄村人选择了假名。